

# 兩件具國際爭議性玉杯的研究

鄧淑蘋

前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研究員

## 提 要

中亞的東半部即今日新疆地區，在此區南緣橫亙著崑崙山，山中蘊藏優質閃玉（nephrite），歷史上多以崑崙山北麓的和闐（清代以前稱為「于闐」）為採集玉料的主要地區。事實上，該區可能自西元五世紀以後已發展本土玉作工藝，或因他們沒有一以貫之地發展屬於自身特色的玉作傳統，總是配合周圍其他強勢文化的需求，製作能銷售得出去的玉器。似乎迄今也未發現千餘年來中亞本地居民對其玉作的紀錄。

何家村白玉多曲長杯、兀魯伯款螭把杯是兩件國際知名玉器。有關其製作地已有多位學者發表論述。筆者於二〇一二年在巴黎、倫敦仔細檢視與此一課題有關的實物，綜合歷史文獻及玉器的風格分析，初步推測二者可能是七世紀與十四世紀至十五世紀初，和闐地區玉工的作品。

**關鍵詞：**中亞玉器、何家村、兀魯伯

## 一、撰文動機

本文擬探討兩件玉杯，第一件為出土於何家村窖藏的白玉忍冬紋八曲長杯。二十世紀九〇年代以來，有多位學者撰文討論它的製作地，究竟是中國唐朝工匠精心仿製？還是來華的波斯或粟特工匠製作？抑或來自波斯的舶來品？其中一位伊朗裔學者認為它是直接來自伊朗地區的「玉酒船」。在他的論文中還有一件藏於羅浮宮博物館的深綠玉石製「酒船」，紋飾風格與何家村白玉八曲長杯頗相似。

擬探討的第二件是藏於大英博物館的碧玉螭把杯。在其腹壁一側刻有帖木兒帝國第三代帝王兀魯伯，在擔任薩馬爾罕行政長官時的名款。在二十世紀七、八〇年代，曾被數位西方學者撰文討論其原作地是在中國？還是中亞？一九八七年筆者引用《明史》資料，推論它是中國玉工作品。此論點曾為西方學者接納。但從近年新出土的考古資料，筆者的舊說應該予以修正。

何家村出土玉杯是陝西歷史博物館的重要展品，筆者看過多次。二〇一二年十月，筆者赴歐出席國際會議，特意申請前往羅浮宮博物館、大英博物館庫房檢視二館藏玉。因此，對前述頗具國際爭議的二件玉杯的製作時空，可作較具體，應更接近史實的推測。

## 二、白玉八曲長杯的研究

### （一）學者們的解讀

圖 1 白玉八曲長杯，長 10.2 寬 5.5 高 3.8 壁厚 0.15 公分，中文報導多稱其外壁淺浮雕的紋飾為：尖葉忍冬捲草紋。它屬何家村窖藏遺物之一，圖 2 也是此窖藏出土的八曲長杯，但是用水晶製作，光素無紋。長 9.6 寬 6 高 2.3 公分，二者尺寸相若，但後者比較短、寬、矮。

陝西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是一九七〇年十月建築工地時意外發現的，出土千餘件寶物，以金銀器、銀錠等、貨幣、玉器、瑪瑙器、水晶器、琉璃器、寶石等為主。<sup>1</sup> 這個窖藏曾被推訂為八世紀中期，傾向認為是安史之亂（755）時所埋。<sup>2</sup> 隨

1 陝西省博物館等，〈西安南郊何家村發現唐代窖藏文物〉，《文物》，1972 年 1 期，頁 30-42。

2 鎮江市博物館、陝西省博物館，《唐代金銀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著金銀器的深入研究，學者認為窖藏年代下限應晚到唐德宗時期（780-805）。<sup>3</sup> 二〇〇三年，齊東方綜合遺物與文獻考證，認為很可能是唐德宗建中四年（783）涇原兵變時，被租庸使劉震埋入地下的珍寶。<sup>4</sup>

唐代時，長安是當時絲綢之路的起點，是與亞歐大陸三百多個國家或地區通商的大都市，所以窖藏寶物的情況複雜，器物製作的年代跨度大，製作的地域性廣，這是大家的共識。其中既有直接從西亞、中亞傳入的器物，也有吸收、融合這些外來元素，發展出新面貌的作品。由於金銀器數量龐大，對於原創造形及在本地發展演變的歷程已有較具體的研究成果。<sup>5</sup> 但是玉石器方面研究較少。<sup>6</sup> 對於何家村出土多曲杯的製作時空，說法就很多樣。

劉雲輝在其二〇〇〇年專書中認為：

光素的水晶八曲長杯造型與波斯薩珊時的石杯、銀杯幾乎完全相同，因此可能是舶來品，或唐朝工匠精心仿製。

白玉忍冬紋八曲長杯、與水晶長杯造型相同，但口沿磨薄、腹壁雕忍冬捲草紋，是中西文化接合產物。<sup>7</sup>

但是齊東方在二〇〇三年的專書中認為：

多曲長杯出現和流行在薩珊，後來影響到其他地區。唐代模仿的實例在銀器曾發現。……何家村的白玉八曲長杯、水晶八曲長杯的形制完全是薩珊式的，但薩珊和中亞罕見這類材質器物，從中國對玉類美石的偏愛上看，似乎應該是在中國的仿造。……白玉、水晶八曲長杯的作者也可能是來華的波斯或粟特工匠。白玉八曲長杯上的忍冬紋主要流行在南北朝時期，入唐後比較罕見，說明仿造的時代可能偏早，因此這兩件八曲長杯製造的年代大約在七世紀。<sup>8</sup>

3 段鵬琦，〈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金銀器小議〉，《考古》，1980年6期，頁536-541、543。

4 齊東方，〈何家村遺寶的埋藏地點和年代〉，《考古與文物》，2003年2期，頁70-74。該文亦刊於齊東方、申秦雁主編，《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遺寶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5 齊東方，《唐代金銀器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6 盧兆蔭、古方，〈略論唐代仿金銀器的玉石器皿〉，《文物》，2004年2期，頁77-85。

7 劉雲輝，《北周隋唐京畿玉器》（重慶：重慶出版社，2000），頁14-15。

8 齊東方，〈何家村遺寶與絲綢之路〉，《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遺寶精粹》，頁35。

伊朗裔法籍學者麥理凱（A. S. Melikian-Chirvani）在一九九五年撰文指認何家村白玉八曲長杯就是八世紀伊朗地區波斯詩歌中的「Rekab」，即是「從薩珊時代到塞爾柱時代的多瓣酒船」。<sup>9</sup> 相似的觀點又發表於他一九九七年的論文〈伊朗文化中的寶石與半寶石器物·第一章·早期伊朗玉器〉。<sup>10</sup> 在該文中他以八世紀為界，將伊朗的歷史分為前後二階段。<sup>11</sup> 認為有六件玉器屬於伊斯蘭時代之前的伊朗玉器（Jade in Iran before Islamic times），有八件屬於伊朗的伊斯蘭時代玉器（Jade in Islamic Iran）。何家村出土的八曲長杯被他歸入後一階段。

他認為這件玉杯的八瓣造形是典型伊朗形制（typical Iranian repertoire），描述其形制：中央是一長條凹瓣，其他凹瓣分布於中央長凹瓣的兩側。（the eight-lobed shape, with the middle lobes on the long sides ensconced within a long incurving rib that determines the lobes on either side of it.）他又從詩歌等波斯古文獻論述：Rekab 是波斯宮廷酒宴中的酒船，除了一件金質，其餘多以銀或水晶製作，但也可能用玉製作，因為用玉是國王的專利。<sup>12</sup>

除了以上藉由波斯詩歌、文獻的分析，以及與其它銀質多瓣酒船的比對外，麥理凱還根據圖片描述器表抽象紋飾可能為「有尖鼻與勾狀羊角的式樣化羊頭」（the abstract ornament suggestive of a stylized ram's head seen sideways with a pointed muzzle and a horn reduced to a hook-like volute.）這種式樣化羊頭紋飾，流行於伊朗被伊斯蘭化的初期，長達三個世紀之久。根據造形和紋飾，綜合前述理由，麥理凱認為何家村的白玉杯是八或九世紀伊朗地區作品。<sup>13</sup>

值得注意的是，在麥理凱一九九七年的論文中，還發表了羅浮宮藏的一件綠色玉石酒船的鳥瞰面與底面。即本文圖 3a、b。<sup>14</sup> 被列入「伊斯蘭時代之前的伊朗玉

9 Melikian-Chirvani, A. S., "Rekab: The Poly-Lobed Wine Boat from Sasanian to Saljug Times," in *Au carrefour des religions*, ed. R. Gyselen, Res Orientales, vol. 7 (Bures-sur-Yvette, 1995): 187-203, 9 figs.

10 Melikian-Chirvani, A. S., "Precious and Semi-Precious Stones in Iranian Culture — Chapter I. Early Iranian Jade,"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New Series/Volume II, 1997, 123-173.

11 薩珊帝國西元六五一年被來自阿拉伯的伊斯蘭哈里發滅亡。學界多認為八至十世紀是伊朗逐漸被全面伊斯蘭化的時期。

12 Melikian-Chirvani, A. S., "Precious and Semi-Precious Stones in Iranian Culture — Chapter I. Early Iranian Jade," 138.

13 Melikian-Chirvani, A. S., "Precious and Semi-Precious Stones in Iranian Culture — Chapter I. Early Iranian Jade." 文中作者相當肯定白玉杯是伊朗製作，但在該文圖 3 的圖說中還是寫著：Iran or China（伊朗或中國）。

14 Melikian-Chirvani, A. S., "Precious and Semi-Precious Stones in Iranian Culture — Chapter I. Early Iranian Jade," fig.2. 而何家村白玉杯是該文的 fig.3。

器」的六件之一。該件是法國考古學家 Roland de Mecquenem 從伊朗西南地區蘇薩市 (Susa) 獲得，器身有三分之一殘缺，一九二八年入藏羅浮宮博物館。質地未經科學檢測，羅浮宮博物館網站資料定為輝玉 (jadeite)，但麥理凱認為可能是閃玉 (nephrite)，可能是六至七世紀薩珊王朝時期製作。文中也提到有一件與綠色玉石酒船同出於蘇薩市的水晶酒船，後者的口沿鑲有一圈金邊，金邊上鏤空成排蜿蜒光芒 (Sinuous rays) 狀，又鑲嵌了其它的 (寶石?)，整個口沿鑲嵌代表太陽。而圖 3 綠色玉石酒船則在口沿刻畫雙鋸齒紋來象徵太陽輻射。麥理凱認為當時可能特意選擇互補色，如：一綠、一白，來製作成組器用。<sup>15</sup>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一日，承蒙羅浮宮博物館古代東方文明部主任 Ms. Françoise Demange 協助，<sup>16</sup> 圖 3 這件綠色玉石容器從展櫃被取出供筆者仔細檢視。結束後筆者再趕往展場觀察與之同出於蘇薩的水晶容器 (圖 4)，後者發表於二〇〇六年的特展圖錄中。<sup>17</sup>

## (二) 筆者的分析與推測

### 1、從薩珊多曲長杯看何家村白玉杯

薩珊王朝時 (226-650) 的橢圓長杯分為不分瓣和分瓣二式。質地多屬銀質，含微量銅及其他元素，有的局部鑲金。長度多超過 15 公分，以 20 公分左右的最常見 (圖 5、6)。<sup>18</sup> 也有的發展成較窄長的器形 (圖 7)。這類長杯從側面看，多作兩端上翹的彎月形。這種尺寸的飲器，符合某些壁畫上所見到飲者或侍者手捧長杯的比例 (圖 8、9)。

齊東方曾分析薩珊器物上的紋樣與信奉拜火教有關的阿那希塔 Anahita 裸體或半裸體女神、葡萄聖樹和水中魚怪等題材，是中國人不理解，也難以接受的。所以，唐代工匠多以各種繁褥細密的植物紋裝飾仿薩珊、仿粟特的金銀器。<sup>19</sup> 齊東方又將在中國發現的這類長杯分為四式，如圖 1、2 何家村出土的白玉、水晶多曲長

15 Melikian-Chirvani, A. S., "Precious and Semi-Precious Stones in Iranian Culture – Chapter I. Early Iranian Jade," 135-136.

16 承蒙巴黎的吉美博物館曹慧中女士協助聯繫，東方部主任 Ms. Françoise Demange 大力襄助，特此申謝。

17 Musée Cernuschi, *Les Perses Sassanides: fastes d'un empire oublié (224-642)* (Paris: Paris-Musées, 2006), pl.100.

18 Ann C. Gunter and Paul Jett, *Ancient Iranian metalwork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and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C.: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Freer Gallery of Art, 1992).

19 齊東方、張靜，〈薩珊式金銀多曲長杯在中國的流傳與演變〉，《考古》，1998 年 6 期，頁 63-73。

杯屬於第 I 式。即：「每一曲線都向器內凹入，兩側的曲線不及底，有矮圈足。」並認為第 I 式主要流行於七世紀後半。<sup>20</sup>

值得注意的是圖 8、9、10 這些壁畫上所見多曲長杯的器身比例，<sup>21</sup> 似乎出土地點越向東接近唐帝國的首都長安，器身越不窄長，逐漸朝向短、寬、深的方向演變。這應該是考慮實用性而忘卻彎月形長杯原有的象徵意涵。

麥理凱分析波斯詩歌內容，解釋彎月形「酒船」的創形理念。根據波斯詩文，紅色葡萄酒象徵「日」，酒船象徵「月」，所以用酒船盛裝紅葡萄酒就是「日」、「月」的結合（Conjunction）。給帝王祝壽的詩歌中，常歌頌帝王是「結合日月（能量）的偉人 Master of Conjunction」。<sup>22</sup> 或因彎月形長杯具有特殊意涵，所以雖然用它盛酒時，實在不太容易將杯中物順利喝下，但這種造形的酒杯卻在薩珊文化圈非常流行。傳播到東方後，自然在實用的前提下逐漸變寬、變深、變平坦。就發展出何家村白玉多曲長杯的模樣。

## 2、有關薩珊王朝植物紋與雕刻風格

水晶容器（圖 4）加了金框的尺寸為：全長 8.9 寬 6.6 高 1.7 公分。綠玉石小容器（圖 3），據筆者推算：長約 5.2 寬約 2.8 高約 1.2 公分。<sup>23</sup> 水晶小容器（圖 4）與綠玉石小容器（圖 3），二者的形制、紋飾、尺寸幾乎一模一樣，推測圖 3 原本也加有金框。羅浮宮博物館 Ms. Françoise Demange 認為本文圖 4 是薩珊王朝時期盛裝胭脂之類珍貴物的「小容器（Petite coupe）」。<sup>24</sup> 筆者很同意此一看法，因為加上如此寬的金邊後就不可能用作飲器，也就不能稱作「酒船」。<sup>25</sup>

據筆者的目驗，圖 3 小容器的質地既非輝玉（jadeite，俗稱翡翠），也非閃玉（nephrite，俗稱和闐玉），而可能是綠色玉髓（chalcedony），即是與水晶同屬石英家族的潛晶質礦物，成分為二氧化矽。如圖 3 這般色濃、幾乎不透明的綠玉髓不多

20 齊東方，《唐代金銀器研究》，頁 51。

21 圖 8 至 10 引自：孫機，《中國聖火》（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頁 217。

22 Melikian-Chirvani, A.S., "Sa'īdā-ye Gilānī and the Iranian style jades of Hindustan,"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13 (1999): 92.

23 筆者並未用量尺測量，只憑所拍手執器物的圖檔推算而得。

24 Musée Cernuschi, *Les Perses Sassanides: fastes d'un empire oublié (224-642)*, pl.100.

25 Melikian-Chirvani, A.S. 曾提及薩珊王朝有水晶酒船，所舉例之一為本文圖 4，其它資料筆者尚未查到。但圖 4 是用以盛裝胭脂的小容器，並非酒船。前文轉引劉雲輝說：薩珊王朝有相似於何家村多曲玉杯的石杯，可能也是類似的誤解。Melikian-Chirvani, A. S., "Precious and Semi-Precious Stones in Iranian Culture — Chapter I. Early Iranian Jade," 138.

見，<sup>26</sup> 也可能為石英類潛晶質的碧石 (jasper)。

所以，筆者二〇一二年親自前往羅浮宮博物館的查訪，雖肯定薩珊王朝時期伊朗地區有成熟的硬石工藝，但以石英家族的水晶、玉髓為主要質材。暫時否定了薩珊時期，甚至王朝結束後的八世紀，伊朗地區有雕琢閃玉的工藝。

圖 3、圖 4 這兩件小容器上面的紋飾頗相似：左右各有一個以一對螺旋渦紋夾持的三瓣葉紋，兩個葉束間夾著菱形格紋。圖 11、12 就是二者的局部。何家村白玉杯的線繪圖 (圖 1 之 e) 是二〇〇〇年才公布於中文書籍中，從清晰的線圖可知，器表均為卷曲舒展的尖葉紋，並未雕琢麥理凱一九九七年論文中所形容的「有尖鼻與勾狀羊角的式樣化羊頭」的抽象紋飾。圖 13 之 a、b 是白玉杯一端局部。比較圖 13 與圖 11、12 三件的局部，再比較圖 1 之 a、d 與圖 3 之 b、圖 4 之 b 三件的全器，可知何家村白玉杯的紋飾在構圖上，以及用寬斜刀的雕琢技法上，相當接近薩珊王朝的硬石雕刻。這樣的三片尖葉成一束的植物紋飾，也見於薩珊王朝時期牆壁上的裝飾圖案 (圖 14、15)。<sup>27</sup> 在薩珊王朝文化圈，這些葉紋似乎無特殊名稱與含意。

### 3、中亞本土玉雕的探索

「中亞」一詞地理範圍如何？目前國際上並無公認的定義。大致而言，中國歷代稱玉門關以西大片草原及沙漠為「西域」。大致以帕米爾高原 (古名「蔥嶺」) 分東、西。今日新疆天山南北麓即是中亞的東半，越過蔥嶺到裏海之間即是中亞的西半。

崑崙山橫亙於今日新疆、西藏交界。山脈裡多個地點蘊藏閃玉 (nephrite) 礦。美玉的圍岩經風化、崩解，玉料隨著融化的雪水自高山滾落，沈積於和闐一帶的玉河中。可能從西元前九、八世紀以後，就是供應東亞華夏民族玉料的主要產地。<sup>28</sup>

26 澳洲出產一種透明度較高的綠玉髓。坊間稱為「澳洲玉」。一九七〇至八〇年代頗流行於台灣藝品店。

27 R.W. Ferrier, *The Art of Persia*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l. 18, 19.

28 過去學術界曾從出土玉器的外觀推論齊家文化時期或商晚期婦好墓階段和闐玉料已東輸中土。但缺乏地質學的支持。近年地質學界懷疑甘肅臨洮馬鬃山蘊藏的閃玉是齊家文化閃玉料來源之一，但有待科學檢測。古代文獻只能證明戰國時期崑崙山閃玉東輸中土。如：西元前二四三年李斯〈諫逐客書〉：「今陛下致昆山之玉」。《史記》紀錄蘇厲與趙惠文王 (西元前 310-266 年) 的對話中有「昆山之玉不出」。但筆者觀察考古出土玉器，認為西周晚年 (西元前九、八世紀) 玉器質地應與春秋、戰國所用閃玉屬同一來源。(西漢) 司馬遷《史記》(臺北：商務印書館，2010，頁 1-622)，〈趙世家〉。

事實上，和闐地區除了長期供應豐沛的玉料外，在南北朝時（五、六世紀）就發展了本土玉雕工藝，成品東輸中土。中文史料甚豐，筆者曾收集整理從南北朝到宋代（420-1126）約七百年內六十多筆文獻，紀錄從西域諸國，如：于闐、高昌、康國、吐番、龜茲、沙州、回鶻、竺西國等輸入玉料與玉器的紀錄。<sup>29</sup> 此外還有二則中國官員奉派于闐、高昌後有關當地製作玉器的文獻：

- (1) 後晉高祖天福三年（938），節度判官高居誨奉派去于闐國（今之新疆和闐），回國後撰文記載該國「器用服飾往往用玉，今中國所有多自彼來耳」。<sup>30</sup>
- (2) 北宋太平興國六年（981）供奉官王延德奉命出使高昌（今之土魯番），回國後也記載當地居民：「人白晰端正，性工巧。善冶金銀銅鐵為器，及攻玉」。<sup>31</sup>

若將前述六十多則史料與考古發掘出土實物核對，可知當時直接從西域傳入的玉器有：帶銜（帶板）、釧、環、指環、佩、簪等服飾；盤、碗、盃等食器；枕、奩、匣、杵、印等雜器；以及玉鞍轡鉸具等拴馬所用皮帶上的玉扣等。不但器類新穎，且所雕紋飾的母題與雕琢風格都與漢魏兩晉玉器不同。

統計文獻可知，于闐國是入貢次數最多、貢品最豐之處，推測也是當時中亞製作玉器的重鎮。當地居民本是操印歐語系東伊朗語的塞族，直到五代末初，于闐國

29 拙作，〈從「西域國手」與「專諸巷」論南宋在中國玉雕史上的重要意義〉，《考古學研究（九）》，2012年4期，頁408-456。

30 《新五代史》：「晉天福三年，于闐國王李聖天遣使者馬繼榮來貢紅鹽、鬱金、犛牛尾、玉疊毛等，晉遣供奉官張匡鄴假鴻臚卿，彰武軍節度判官高居誨為判官，冊聖天為大寶于闐國王。」（宋）歐陽修，《新五代史》（臺北：鼎文書局，1987，頁909-923），卷74，〈四夷附錄第三〉。相同紀錄見：（宋）王欽若，《冊府元龜》（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7，頁11425），卷972，〈外臣部十七·朝貢第五〉。《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卷三引《高居誨行記》「齊國採玉之地云玉河。在于闐城外。其源出昆山，……一曰白玉河，……二曰綠玉河，……三曰烏玉河……每歲五六月大水暴漲，則玉隨流而至，玉之多寡由水之大小，七八月水退乃可取，彼人為之撈玉。其國之法，官未採玉，禁人輒至河邊者。故其國中器用服飾往往用玉，今中國所有多自彼來耳。」（宋）唐慎微，《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文淵閣四庫全書，頁740-89），卷3。

31 《宋史》：「太平興國六年，……五月，太宗遣供奉官王延德、殿前承旨白勳使高昌。……雍熙元年四月，王延德等還，敘其行程來獻，云：……高昌即西州也。其地南距于闐，西南距大食、波斯，西距西天步路涉、雪山、蔥嶺，皆數千里。地無雨雪而極熱，每盛暑，居人皆穿地為穴以處。……人白皙端正，性工巧，善冶金銀銅鐵為器及攻玉。」（元）脫脫，《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87，頁14103-14126），卷490，〈外國六〉。

的王族仍屬此族。<sup>32</sup>十一世紀初始被信奉伊斯蘭教的喀喇汗國所滅，後者是阿爾泰語系的突厥、回鶻族群所建立。<sup>33</sup>

南北朝以來，屬伊朗人種的粟特長期經營中亞絲路上的商貿，他們聚居於今日薩馬爾罕一帶，隋唐文獻中稱之為「昭武九姓」。<sup>34</sup>唐代曾在薩馬爾罕一帶設置「河中府」，故近代多稱該區為「河中地區」。史載北朝晚期西域人何通就是有名的製玉高手，其子何稠在北周至唐初時，以擅長各種工藝而受朝廷重用。何通也因此留名青史。<sup>35</sup>

突厥與回鶻關係密切，隋唐五代時，較多回鶻聚居的高昌（今日土魯番），與較多粟特聚居的康國（今日薩馬爾罕）也分別進貢過玉盤、玉環。<sup>36</sup>

總之，南北朝至隋唐近五百年（420-907），玉器器類與紋飾風格的變化，可能是多民族、多文化共同交織的成果。直到元、明時期，突厥與蒙古族系的融合，才給中亞、西亞的玉器文化帶來新的面貌。

### 三、兀魯伯螭把杯的研究

#### （一）早年學者們的解讀

大英博物館典藏一件碧玉雕螭把杯（圖 16），最新公布其正確尺寸為：長 19.5 寬 12.2 高 7.3 公分。橢圓形容器，一端立雕一螭虎，雙耳之間有一長角。螭虎的口與前爪均銜攀於器之口沿，長尾與雙腿攀附於腹壁下方，彎拱且扭曲的身軀形成把

32 張廣達、榮新江，〈上古于闐的賽種居民〉，《于闐史叢考》（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頁 149-165。

33 喀喇汗國（Qarakhanid Dynasty）見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大英百科全書線上版），<http://www.britannica.com/topic/Qarakhanid-dynasty>（瀏覽日期：2015 年 7 月 10 日）。

34 榮新江，〈從薩馬爾罕到長安——中古時期粟特人的遷徙與入居〉，榮新江、張志清主編，《從薩馬爾罕到長安——粟特人在中國的文化遺跡》（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頁 3-8。

35 《隋書》：「何稠，字桂林，國子祭酒妥之兄子也。父通，善斫玉。」（唐）魏徵，《隋書》（臺北：鼎文書局，1987，頁 1596），〈列傳三十三〉。《隋書》：「何妥，字棲鳳，西城人也。父細胡，通商入蜀，遂家郫縣，事梁武陵王妃，主知金帛，因致巨富，號為西州大賈。」（唐）魏徵，《隋書》，頁 1709，〈列傳四十〉。此處「西城人也」，經封傳兵考證，「西城人」三字應為「西域人」。見封傳兵，〈何妥為西域人及其他——中華本《隋書·儒林傳》校誤〉，《新世紀圖書館》，2014 年 2 期，頁 81-83。

36 《舊唐書》：「高昌者，……太宗嗣位，復貢玄狐裘，因賜其妻宇文氏花鈿一具。宇文氏復貢玉盤。」（後晉）劉昫，《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7，頁 5294），卷 198，〈列傳第一百四十八·西戎〉。《冊府元龜》：「（開元）二十八年……康國遣使獻寶香爐及白玉環瑪瑙水精眼藥瓶子。」（宋）王欽若，《冊府元龜》，卷 971，頁 11411，〈外臣部十六·朝貢第四〉。

手。一側口沿下方器壁陰刻草體阿拉伯文「Ulugh Beg Kuragan」（圖 16b）。與螭虎柄相對的一端包覆一銀片，可能是為覆蓋破口。銀片上以土耳其文刻著「上帝之恩無限」。可能是一六〇〇至一八〇〇年間在鄂圖曼帝國修復。<sup>37</sup>

「Ulugh Beg Kuragan」即是《明史·西域傳》中的「兀魯伯曲烈干」。是帖木兒帝國（1370-1506年）開國之君帖木兒（Timur）之孫，沙哈魯（Shah Rukh）之子。「曲烈干 Kuragan」此一頭銜意指：皇室駙馬（Royal Son-in-law）。因為他的妻子是成吉思汗的後代，兀魯伯在一四一七年獲此尊號。<sup>38</sup>

兀魯伯出生於一三九四年，西元一四〇九至一四四七年長期擔任河中地區的行政長官，令薩馬爾罕成為中亞重要的商貿、學術中心。最有名的史蹟是建立了兀魯伯天文台。一四四七年繼沙哈魯為帖木兒帝國的第三代國君。一四四九年被暗殺身亡。值得注意的是，兀魯伯曾參加沙哈魯派遣的龐大使節團，於一四一九至一四二二年出使大明帝國。<sup>39</sup> 其間在北京停留將近一年。這種經歷應該增加他對中國文化的興趣。

二十世紀七、八〇年代，曾有四位西方學者撰文討論這件螭把玉杯的原作地是在中國？還是中亞：

1、一九六〇至六一年大英博物館季刊上，發表了華威廉（William Watson）與 Ralph Pinder-Wilson 聯名的文章〈一件來自薩馬爾罕的刻銘玉杯〉。<sup>40</sup> 他們分析這件玉杯的造形，認為：

它的形制，如有圈足及近乎垂直的器壁都是中國式，有獨角和雙叉尾的扭曲身體的老虎，是中國神話動物，流行於宋代或更早。雖無法肯定，但即或玉杯不是在中國雕琢，也是模仿中國款式。（譯文）

37 此段資料是綜合一九六〇至六一年第一次的出版（本文註43），與二〇一二年大是文化出版社，《看得見的世界史》（大英博物館與BBC合作，*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0 Objects* 資料中譯本）。一九六〇至六一的資料寫作：Ulugh Beg Gurgan。Neil MacGregor,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0 objects* (London: Penguin Books, 2010). 尼爾·麥葛瑞格 (Neil MacGregor), 《看得到的世界史：99樣物品的故事你對未來會有1個答案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0 Objects)》，劉道捷、捨已安譯（臺北：大是文化有限公司，2012）。

38 兀魯伯 (Ulugh Beg)，亦可翻譯為「烏魯伯格」。華威廉等考證他在一四一七年獲得 Guragan (Kuragan) 的尊號。見 Pinder-Wilson, Ralph, and William Watson, "An Inscribed Jade Cup from Samarkand," *British Museum Quarterly*, vol. 23 (1960-61): 19-22.

39 火者·蓋耶速丁 (Khwaja Ghiyasu'hiyas)，《沙哈魯遣使中國記》，何高濟譯（北京：中華書局，2002）。

40 Pinder-Wilson and Watson, "An Inscribed Jade Cup from Samarkand," 19-22.

但由於螭虎把柄造形不佳，尤其是螭虎面孔粗製濫造，雕琢草率，華威廉等認為：

它他不同於習見的中國藝術品上的螭紋。此外這件玉杯的顏色與質感也非中國人所愛好的玉料。(翻譯大意)

由於當時帖木兒帝國與大明帝國間交流頻繁，帖木兒帝王喜好中國瓷器等，所以華威廉等認為：

很難相信在沒有中國玉工的情況下，刻帖木兒玉棺上銘文的雕玉工匠。不能仿雕中國造形的玉器。(譯文)

總之，華威廉等對這件玉杯的原作地始終存疑，認為可能是北京的中國玉工，也可能是中國西部或中亞一帶的玉工製作。

2、到了一九六八年，英國學者韓斯福（Howard Hansford）在其專書《中國玉雕》中討論此玉杯。<sup>41</sup> 據韓氏的報導，一九六六年六至七月間，維多利亞與阿伯特博物館（Victoria & Albert Museum）舉辦伊斯蘭玉器展，這件玉杯被標示為「十五世紀早期，中國或中亞」。但是同時展出其他數件造形無疑源自伊斯蘭金屬器的玉杯，其中也有刻兀魯伯名款的。其風格和技術完全不同於本文圖 16 這件玉杯。

那什麼是西方學者認可的「無疑是源自伊斯蘭金屬器的玉杯」呢？據筆者的瞭解，就是如圖 17、18 這樣的碧玉龍柄杯。這類玉杯存世至少八件。<sup>42</sup> 器柄的龍頭一定接觸杯的口沿，形成圓弧環孔可穿繩綁繫於騎馬者的腰帶上。西方學者認為這類玉杯源於如圖 19 那樣的金屬龍柄杯，後者在龍口處有一活環，也是供穿繩掛繫騎馬者腰帶用的。<sup>43</sup>

韓斯福將這件玉杯發表於《中國玉雕》一書，顯然傾向於相信玉杯是中國作品。他認為：

最有名的是沙哈魯於一四一九年派遣大使自首都哈烈（Herat）到中國覲見明成祖永樂皇帝。在中國停留一年，回程時，於一四二二年經過和闐。在

41 Hansford, Howard, *Chinese Carved Jade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8), pl.79.

42 拙作，〈龍虎西域——帖木兒帝國玉雕探索〉，《故宮文物月刊》，2015 年（期數未定）。

43 Canby, Sheila R., *Shah Abbas: The Remaking of Iran*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9), 160.

明朝初年，玉的產地（指和闐地區）無論在名義上、實質上，都屬帖木兒帝國統治。我們或可認為，前往東方的使者帶了珍貴的石頭（指玉料）作為給（中國）皇帝的禮物，而可能帶回更多的（玉器）給薩馬爾罕或哈烈的君王。（譯文）

- 3、一九七五年，維多利亞與阿伯特博物館舉辦中國玉器特展，並出版專書。主要的作者是潔西卡·羅森（Jessica Rawson）這件玉杯收入專書的第 325 號。<sup>44</sup> 標示為：「十四世紀至十五世紀早期，中國或中亞」。書中雖未有太多的說明，但將之與其數件附有鏤空立雕螭紋的玉「杯」，<sup>45</sup> 同時編入宋代至明代早期仿古風格的章節中。並改稱之為「似蜥蜴的龍（lizard-like dragon）」
- 4、一九八〇年屈志仁（James Watt）在其《漢代至清代的中國玉雕》一書中，<sup>46</sup> 討論第 139 號明代陸子剛款玉杯時，也討論了兀魯伯款玉杯。他的看法是：

該玉杯是綠色，器壁厚，相當光素。是明代北方玉雕特色。不同於當時南方尚白色、多紋飾的風格。（翻譯大意）

這種觀察並未解決基本問題，但如果兀魯伯款玉杯是在中國製作的話，那可能是在北京、或北京與玉的原產地（指新疆和闐）之間的某個地方。（譯文）

一九八三年筆者即從《明史》中查得資料重要資料：<sup>47</sup>

（明英宗）十年十月，書諭其王兀魯伯曲烈干曰：「王遠處西陲，恪修職貢，良足嘉尚。使回，將賜王及王妻子彩幣表裡，示朕優待之意」別敕賜金玉器、龍首杖、細馬鞍，及諸色織金文綺。

根據這份資料，筆者於一九八七年發表專文〈流傳海外疑似賚賞的玉器〉，推測正統十年（1445），明英宗所贈予的「金玉器」中，可能就有本文所討論的螭把杯。

44 Ayers, John, & Rawson, Jessica, *Chinese jade throughout the ages* (London: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1975).

45 許多被西方學者稱為「杯」的中國古代容器，在中國是當作書寫時的水盂，而非飲食器的杯子。故，筆者加上括弧。

46 Watt, James C. Y., *Chinese Jades through Han to Ch'ing* (New York: The Asia Society in association with Weatherhill, Inc., 1980).

47（清）張廷玉，《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87，頁 8599），卷 332，〈列傳第二百二十·西域四〉。

由於兀魯伯頗珍視來自東方大明皇帝的禮物，所以特別刻上自己的名款。<sup>48</sup>

## (二) 文獻所見明代早期中亞玉作資料<sup>49</sup>

筆者曾從《明史》、《明實錄》及其他史料等摘取表列明代（1368-1644）中亞與中原雙方玉器、玉料交流的記錄約十六則。<sup>50</sup> 值得注意的是，與南北朝、隋唐、五代時，文獻記載中亞與中原雙方玉器、玉料交流情況大不相同的現象是：以前多紀錄從中亞傳入玉器成品；但在明代時，經常由中亞輸入的不是玉器成品，而是玉料。

明成祖永樂四年（1406），曾有回回進貢玉碗，這本是草原民族表示友好的方式，但明成祖不瞭解對方善意，就毫不領情地退還了。<sup>51</sup> 相反地，明成祖還在永樂三年、九年（1405、1411）分別在冊封哈密領袖脫脫、免力帖木兒時，賜他們二人以玉帶。<sup>52</sup> 明英宗正統十年（1445），也賞賜在薩馬爾罕的兀魯伯以金玉器。前文已有引述。

但是，迄今並未發現明代有關中亞玉作的中文資料。倒是有西班牙文、波斯文有關中亞和闐地區玉雕的紀錄各一則：

- 1、西元一四〇三至一四〇六年西班牙人克拉維約隨使節團出使帖木兒帝國，所撰寫的旅行記錄被翻譯為多國文字。楊兆鈞根據土耳其譯本翻譯為中文《克拉維約東使記》。文中記錄：「在薩馬爾罕城內，有自和闐運來寶石、瑪瑙、珠寶，及各樣珍貴首飾。和闐所產之貨，具極名貴者，皆可求之於薩馬爾罕市上。和闐之琢玉鑲嵌之工匠，手藝精巧，為世界任何地所不及」。<sup>53</sup>
- 2、印度學者 Dr. M.L.Nigam 在印度海得拉巴市 Hyderabad 的沙拉金博物館 Salar Jung Museum 的圖書館中找到一篇古老的波斯文抄本，記述和闐地區不但產玉料、製作玉器，也使用玉器。其中引用了帖木兒帝國第二代國君沙哈魯（1405-1447 在位）的臣子 Mohammed Haji 的記載，他不但奉命將各種玉石療效撰寫

48 拙作，〈流傳海外疑似賚賞的玉器〉，《故宮文物月刊》，47 期（1987.2），頁 14-35。

49 明代歷史分期大約為：早期（1368-1435）、中期（1435-1566）、晚期（1566-1688）。

50 拙作，〈從「西域國手」與「專諸巷」論南宋在中國玉雕史上的重要意義〉，頁 408-456。

51 《明史》：「四年……是年……回回結牙曲進玉碗，卻之。」（清）張廷玉，《明史》，卷 6，〈本紀第六·成祖二〉，頁 84。相似的紀錄見於：（明）余繼登，《皇明典故紀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 97），卷 7、（明）嚴從簡，《殊域周咨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 764），卷 11。

52 均記錄於：（清）張廷玉，《明史》，卷 329，〈列傳第二百十七·西域一〉。

53 羅·哥澤來滋·克拉維約（Ruy Gonzonzo de Clavijo），《克拉維約東使記（Embajada a Tamorlor）》，奧瑪·李查（Omer Riza）譯，楊兆鈞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57），頁 57。

成書，還強調「由於 Shah Rukh 及其皇后對玉的珍愛，使得產玉的和闐地區的居民也重視玉器，玉器成為人們社會地位的象徵」。<sup>54</sup>

### (三) 考古出土宋、元、明代螭虎紋玉器

筆者一九八七年的觀點頗受西方學者的肯定。多年來在大英博物館的網站上都將該件玉杯訂為中國製作。一九九五年七月筆者赴倫敦出席國際會議時，也申請在庫房檢視該件玉杯，並維持自己原有的看法。但是筆者近年改變觀點，認為兀魯伯螭把杯可能是元代晚期至明代早期，也就是十四世紀後半至十五世紀早期。在中亞東部的和闐地區製作。

在此，筆者要先給玉杯把柄所雕的動物予以正名。它不是所謂的「龍」，而是「虎」，因具有文化所賦予的神性，故稱為「螭虎」。

東亞地區約自新石器時代就出現龍與虎伴隨出現的二元母題。<sup>55</sup> 漢代時特別流行，且二者除了頭部造形明顯差異外，身軀非常相似，均作具四肢與長尾的蜿蜒扭曲狀。<sup>56</sup> 六朝、隋唐吸收融合大量異族文化，到了宋代本土文化意識抬頭，仿古風興，幾乎失憶的「龍—虎」二元母題再度蓬勃登場。二者的體軀多非常相似，但以卷鼻、飄鬣、長角表現「龍」，以寬頰、突吻、立耳表現「虎」。所以兀魯伯款玉杯把柄的動物造形應該是具有神性的「螭虎」，二耳間還長了長角。

近年來陸續發掘、公布一些宋、元、明代考古出土的雕有螭虎紋的玉器。可據以建立這段時期螭虎紋大致的發展脈絡：<sup>57</sup>

1、南宋時期（西元 1127-1279 年）墓葬出土螭虎紋可分寬、尖兩種臉型。多半在脊背中央刻畫陰線一道。

54 Nigam, M.L. "Fresh light on the history of Indian Jade-carving," *Kala, Journal of Indian Art History Congress*, New Delhi, Vol. IX (2004): 13-18.

55 年代最早的龍——虎母題為年代約西元前四千五百年左右，河南濮陽西水坡仰韶文化墓葬出土用蚌殼堆塑的龍、虎。到了西元前三千餘年，在遼西紅山文化，太湖流域的崧澤——良渚文化，分別出現玉雕胚胎形龍、虎。見拙作，〈紅山系玉器研究的再思〉，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紅山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13），頁 321-346。拙作，〈探索崧澤——良渚系「龍首飾」〉，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編，《2014 年崧澤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杭州：崧澤文化學術研討會，2014 年 10 月 10-11 日）。

56 最常見於漢代以來的畫像磚，或一些四靈紋圖像中。

57 拙作，〈寫實與仿古交會下的南宋玉器〉，《文藝復興——南宋藝術與文化·器物卷》（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0），頁 32-44。拙作，〈尚真、崇玄——南宋玉器精神之體現〉，《故宮文物月刊》，331 期（2010.10），頁 46-63。拙作，〈從「西域國手」與「專諸巷」論南宋在中國玉雕史上的重要意義〉，頁 408-456。

- (1) 寬臉型：在南宋早期墓葬出土三件雕有螭虎紋的玉器，都屬寬臉型。圖 20、21 兩件，出於南京江寧鎮建中村秦檜夫人墓（紹興二十五年，1155）。<sup>58</sup> 圖 22 出土於南京江寧鎮上坊趙朗夫妻合葬墓（乾道元年，1165）。<sup>59</sup> 筆者於南京市博物館檢視實物，圖 21 雕琢精緻，另二件做工較粗，但線圖正確。<sup>60</sup> 圖 21 出土於浙江金華鄭繼道墓（嘉泰元年，1201）。<sup>61</sup> 與圖 24 同出一墓，但二壁上螭虎紋的臉型不同。
- (2) 尖臉型：圖 24 至 27。分別出於鄭繼道墓（1201）、<sup>62</sup> 四川蓬安錦屏鎮西拱橋村南宋墓。<sup>63</sup> 杭州浙大第 16 號，<sup>64</sup> 海寧智標塔。<sup>65</sup> 這幾件玉器上淺浮雕的螭虎頭部呈三角形，一對下折的大虎耳之間長了一條長角或一束鬣毛，一對圓眼似用尖銳的管鑽工具鑽成。可作為十三世紀早、中期的典型風格。根據智標塔出土錢幣可知，該塔地宮建造年代應在元至正年以後。浙大第 16 號墓為早年出土非正式發掘的墓葬。此二處出土的玉方環可能屬南宋末年至元初玉雕，螭虎額頭出現二道陰線，但臉龐仍呈三角形，智標塔玉環螭虎眼睛還呈既小又深的圓眼。
- 2、元代（1271-1368）墓葬出土雕有螭虎紋的玉器頗多，但有的還具有南宋風格，如元代早期范文虎墓出土玉貫耳壺的玉蓋，蓋上浮雕寬臉型螭虎，頗相似圖 23 南宋中期風格。<sup>66</sup> 也有學者考證認為該件玉貫耳壺兼具宋元特徵。<sup>67</sup> 圖 29 至 32

58 國家文物局編，〈南京建中村南宋墓〉，《2004 中國重要考古發現》（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頁 169-174。部分玉器發表於：南京市博物館，《金玉滿堂》（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

59 南京市博物館編，〈南京江寧上坊宋墓〉，《南京文物考古新發現》（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頁 122-130。

60 筆者曾以為圖 22 可能是畫圖不準確，但二〇一三年四月，蒙白寧館長准許檢視南京市博物館庫藏實物，確知線圖正確。

61 趙一新等，〈金華南宋鄭繼道家族墓清理簡報〉，《東方博物》，2008 年 3 期，頁 54-61。

62 趙一新等，〈金華南宋鄭繼道家族墓清理簡報〉，頁 54-61。此件曾借展至國立故宮博物院，收入蔡玫芬主編，《文藝紹興：南宋藝術與文化·器物篇》（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0）。

63 鄭幼林、李力，〈四川蓬安縣西拱橋村宋墓簡述〉，上海博物館編，《中國隋唐至清代玉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 31-33。

64 此墓出土文物藏於浙江省博物館，未有正式報告。玉器一件曾借展至國立故宮博物院，收入蔡玫芬主編，《文藝紹興：南宋藝術與文化·器物篇》，頁 32-44。

65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海寧智標塔》（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

66 范文虎墓於一九五六年發掘，簡報為：白冠西，〈安慶市棋盤山發現的元墓介紹〉，《文物》，1957 年 5 期，頁 52-56。

67 左駿，〈孰宋？孰元？——安慶元范文虎墓三件玉器的考古學觀察〉，張宏明等主編，《玉英溯源——安徽歷代玉器研究文萃》（合肥：黃山書社，2015），頁 219-246。

則為發展成熟的典型元代螭虎紋，臉龐多呈梯形，額頭刻有三道橫線（或為抬眉紋？）口啣靈芝，雙耳間或有長角，或有一束披散的鬣毛。<sup>68</sup>

- 3、目前考古所見以單一螭虎裝飾於杯子外壁，年代最早的是四川出土南宋銀夾層螭虎飾杯（圖 33）。<sup>69</sup> 考古尚未發掘到宋、元時期單螭虎柄的玉杯。不過傳世器中確有可能屬元代單螭虎柄玉杯。圖 34 即本院藏品，與圖 33 尺寸相若，均為口徑 7、8 公分，直壁、深腹，器壁厚薄適中，口沿薄且微撇，適合用作飲器。螭虎有一對深鑽小圓眼，額上三道平行陰線，腦後披大片鬣毛，但無角，沿突起的背脊刻一道陰線，兩側數道短橫線表示肋骨。南宋晚期史繩祖墓出土的銅龍柄鬲形爐，在銅香爐外壁對稱攀爬兩隻似龍似虎的神獸，亦鑄出中脊，兩個前爪攀附器口緣（圖 35a、b）。<sup>70</sup>

在復古的風潮下，南宋以降，文人書齋中盛水的筆洗或盛灰的香爐常以一對龍紋或螭虎紋裝飾器表，有銅、瓷、玉等質地。觀察其尺寸與口緣厚度、是否磨薄外撇等現象可判斷，該器是用作文具？還是飲食器？

- 4、目前在中國境內考古發掘雙螭把玉容器共三件，但口緣都不薄撇，可知應用作文房水盛，而非飲食器。圖 36 是迄今出土品中年代最早的一件，出土於北京市南郊萬貴墓（成化十一年，1475）。<sup>71</sup> 根據首都博物館典藏者描述，也以陰線表現背脊中線，左右有表示肋骨的短橫線。<sup>72</sup> 圖 37 出土於甘肅蘭州晏家坪明代肅王家族墓，據考證墓主下葬年份約萬曆十六至二十年（1588-1593）。<sup>73</sup> 第三件則年代更晚。<sup>74</sup>

68 錢裕墓於一九六〇年發掘，簡報為：無錫市博物館，〈江蘇無錫市元墓中出土的一批文物〉，《文物》，1964 年 12 期，頁 52-60。墓中出土玉器見：徐琳，〈錢裕墓出土元代玉器綜述〉，《故宮文物月刊》，193 期（1999.4），頁 72-89。甘肅張掖大佛寺金塔殿出土四件元代玉帽頂，楊伯達曾作論證，見氏著，〈宋元明清玉器鑑定四題的探討〉，上海博物館，《中國隋唐至清代玉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 97-107。圖 27、30 出土墓葬確定，但似乎無正式發掘簡報。

69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彭州宋代金銀器窖藏》（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

70 衢州市文管會，〈浙江衢州市南宋墓出土器物〉，《考古》，1983 年 11 期，頁 1004-1011。

71 萬貴墓於一九五七年發掘，出土物藏於北京市首都博物館。但迄今未見正式報告。圖引自該館出版普及小冊。

72 張彩娟描述，發表於：張尉，《新見古玉真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頁 225。

73 朱亦梅，〈蘭州晏家坪明肅藩系延長王墓葬發掘記〉，《東方收藏》，2012 年 5 期，頁 78-81。

74 出於沐睿墓（約 1609）。見南京市博物館，〈江蘇南京市明黔國公沐昌祚、沐睿墓〉，《考古》，1999 年 10 期，頁 45-56。

### (三) 筆者新的看法

筆者於二〇一二年十月在大英博物館庫房中再度檢視圖 16 這件兀魯伯款螭把杯。它是一件橢長、壯碩、厚重，流露「豪放」氣息的玉容器。長達 19.5、寬達 12.2、高 7.3 公分，但只有一個螭虎把柄，口緣明顯磨薄並外撇，整體觀之，應當用作飲食器。這樣大容量的杯子，較合乎中亞草原民族的飲食習性。

再仔細觀察細部特徵：螭虎面孔五官扁平，以陰線刻畫橄欖形眼睛，額頭三條短線，表情有些兇狠。(圖 16a、f) 雙耳間的長角壓在大片鬣毛上，鬣毛整個披向後腦左側，鬣毛下的肩頸部位有大塊凹缺，玉工未加修磨；(圖 16e) 螭頭下巴下方留有一大塊應該切除的玉料，因需要將琢玉工具穿過螭虎攀繞的四肢才能進行切除多餘玉料的工序，大約玉工感到費事，就不予處理。因此這件螭虎就有個極為厚重結實的雙下巴(圖 16a)。這樣粗放的風格，實在不像明代中國玉工的作品，基本排除了作為明英宗贈送給兀魯伯國禮的可能性。

兀魯伯玉杯所刻的螭虎，額頭刻有三道短橫線，背脊上刻有一道寬深陰線，呈現元代風格。蒙元王室成員本即分別統治亞歐大陸的大部分疆域，當時文化、藝術東西交流頻繁。由於東亞中國是亞歐大陸最重要的玉雕藝術發展中心，中亞玉雕在受到東亞中國風格影響下，也可能發展的步調較晚。

前文已說明兀魯伯的生平，將陰刻草體阿拉伯文「Ulugh Beg Kuragan (皇室駙馬兀魯伯)」刻於玉杯外壁的時間，應該是西元一四一七年他獲此尊號以後，到一四四九年他被暗殺之前。當時東亞已進入明代中期。

前文已列舉四則文獻，證明十世紀以後和闐地區玉作興盛，十五世紀初西班牙人克拉維約紀錄：「和闐所產之貨具極名貴者，皆可求之於薩馬爾罕市上。和闐之琢玉鑲嵌之工匠，手藝精巧，為世界任何地所不及」。兀魯伯款的螭把杯或可能是元代晚期至明代早期，也就是十四世紀後半至十五世紀早期，和闐玉工的作品。

## 小 結

廣袤的亞歐大陸上有太多民族、太多文化彼此交流融合。中亞的和闐以產玉料為名，反而被大家忽略了千餘年來該處也一直是玉作中心。和闐玉工應以塞族為主，粟特人、突厥人、或突厥系的維吾爾人或也加入雕玉的行業。或因他們沒有發展屬於自身特色的玉作傳統，總是配合周圍其他強勢文化的需求，製作他們能銷售得出去的玉器。

和闐地區的居民似乎從未有心記錄他們自己的工藝發展歷程，所以。我們只能從中文、波斯文、西班牙文的紀錄中尋找線索，也只能從風格比對中，希望勾勒出歷史上中亞玉器的真實面貌。

何家村白玉多曲長杯、兀魯伯款螭把杯，可能就是七世紀、十四世紀後半至十五世紀早期和闐玉作品。筆者希望拙文能發揮拋磚引玉之效，希望日後有更多人參與此一探索的隊伍。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西漢) 司馬遷《史記》，臺北：商務印書館，2010。
- (唐) 魏徵，《隋書》，臺北：鼎文書局，1987。
- (後晉) 劉昫，《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7。
- (宋) 王欽若，《冊府元龜》，臺北：鼎文書局，1967。
- (宋) 唐慎微，《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文淵閣四庫全書。
- (宋) 歐陽修，《新五代史》，臺北：鼎文書局，1987。
- (元) 脫脫，《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87。
- (明) 余繼登，《皇明典故紀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明) 嚴從簡，《殊域周咨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清) 張廷玉，《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87。

### 二、近代論著

- 中國金銀玻璃琺瑯器全集編委會，《中國金銀玻璃琺瑯器全集》，石家莊：河北美術，2002。
- 火者·蓋耶速丁 (Khwaja Ghiyasu'hiyas)，《沙哈魯遣使中國記》，何高濟譯，北京：中華書局，2002。
- 古方，《中國出土玉器全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
- 白冠西，〈安慶市棋盤山發現的元墓介紹〉，《文物》，1957年5期，頁52-56。
- 左駿，〈孰宋？孰元？——安慶元范文虎墓三件玉器的考古學觀察〉，張宏明等主編，《玉英溯源——安徽歷代玉器研究文萃》，合肥：黃山書社，2015，頁219-246。
- 甘肅省博物館，《絲綢之路：甘肅文物精華》，蘭州：甘肅省博物館，1994。
- 甘肅省博物館，《甘肅省博物館文物精品圖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 尼爾·麥葛瑞格 (Neil MacGregor)，《看得到的世界史：99樣物品的故事你對未來會有1個答案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0 Objects)》，劉道捷、拾已安譯，臺北：大是文化有限公司，2012。
- 朱亦梅，〈蘭州晏家坪明肅藩系延長王墓葬發掘記〉，《東方收藏》，2012年5期，頁78-81。
-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彭州宋代金銀器窖藏》，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
- 南京市博物館，〈江蘇南京市明黔國公沐昌祚、沐睿墓〉，《考古》，1999年10期，頁45-56。
- 馬自樹，《中國文物定級圖典》，上海：上海辭書，1999。

- 南京市博物館編，《南京文物考古新發現》，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 南京市博物館，《金玉滿堂》，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
- 封傳兵，〈何妥為西域人及其他——中華本《隋書·儒林傳》校誤〉，《新世紀圖書館》，2014年2期，頁81-83。
- 段鵬琦，〈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金銀器小議〉，《考古》，1980年6期，頁536-541、543。
- 陝西省博物館等，〈西安南郊何家村發現唐代窖藏文物〉，《文物》，1972年1期，頁30-42。
-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海寧智標塔》，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
- 徐琳，〈錢裕墓出土元代玉器綜述〉，《故宮文物月刊》，193期，1999年4月，頁72-89。
- 孫機，《中國聖火》，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
- 齊東方、張靜，〈薩珊式金銀多曲長杯在中國的流傳與演變〉，《考古》，1998年6期，頁63-73。
- 國家文物局編，《2004中國重要考古發現》，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 張尉，《新見古玉真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 張廣達、榮新江，〈上古于闐的賽種居民〉，《于闐史叢考》（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頁149-165。
- 無錫市博物館，〈江蘇無錫市元墓中出土的一批文物〉，《文物》，1964年12期，頁52-60。
- 趙一新等，〈金華南宋鄭繼道家墓清理簡報〉，《東方博物》，2008年3期，頁54-61。
- 楊伯達，〈宋元明清玉器鑑定四題的探討〉，上海博物館，《中國隋唐至清代玉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97-107。
- 齊東方，〈薩珊式金銀多曲長杯在中國的流傳與演變〉，《考古》，1998年期，頁63-73。
- 齊東方，《唐代金銀器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 齊東方，〈何家村遺寶的埋藏地點和年代〉，《考古與文物》，2003年2期，頁70-74。
- 齊東方、申秦雁主編，《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遺寶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 榮新江、張志清主編，《從薩馬爾罕到長安——粟特人在中國的文化遺跡》，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
- 蔡汝芬主編，《文藝紹興：南宋藝術與文化·器物篇》，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0。
- 鄭幼林、李力，〈四川蓬安縣西拱橋村宋墓簡述〉，上海博物館編，《中國隋唐至清代玉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31-33。
- 鄧淑蘋，〈流傳海外疑似贗賞的玉器〉，《故宮文物月刊》，47期，1987年2月，頁14-35。
- 鄧淑蘋，〈寫實與仿古交會下的南宋玉器〉，《文藝紹興——南宋藝術與文化·器物卷》，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0，頁32-44。
- 鄧淑蘋，〈尚真、崇玄——南宋玉器精神之體現〉，《故宮文物月刊》，331期，2010年10

月，頁 46-63。

鄧淑蘋，〈從「西域國手」與「專諸巷」論南宋在中國玉雕史上的重要意義〉，《考古學研究（九）》，2012 年 4 期，頁 408-456。

鄧淑蘋，〈紅山系玉器研究的再思〉，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紅山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13，頁 321-346。

鄧淑蘋，〈探索崧澤——良渚系「龍首飾」〉，杭州：崧澤文化學術研討會，2014 年 10 月 10-11 日。

鄧淑蘋，〈龍虎西域——帖木兒帝國玉雕探索〉，《故宮文物月刊》，2015 年（期數未定）。

劉雲輝，《北周隋唐京畿玉器》，重慶：重慶出版社，2000。

盧兆蔭、古方，〈略論唐代仿金銀器的玉石器皿〉，《文物》，2004 年 2 期，頁 77-85。

鎮江市博物館、陝西省博物館，《唐代金銀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羅·哥澤來滋·克拉維約（Ruy Gonzonz de Clavijo），《克拉維約東使記（*Embajada a Tamorlor*）》，奧瑪·李查（Omer Riza）譯，楊兆鈞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57。

衢州市文管會，〈浙江衢州市南宋墓出土器物〉，《考古》，1983 年 11 期，頁 1004-1011。

Ayers, John, & Rawson, Jessica. *Chinese jade throughout the ages*. London: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1975.

Canby, Sheila R.. *Shah Abbas: The Remaking of Iran*.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9.

Cernuschi, Musée. *Les Perses Sassanides: fastes d'un empire oublié (224-642)*. Paris: Paris-Musées, 2006.

Ferrier, R.W.. *The Art of Persia*.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Gunter, Ann C. and Jett, Paul. *Ancient Iranian metalwork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and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C.: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Freer Gallery of Art, 1992.

Hansford, Howard. *Chinese Carved Jade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8.

Lentz, Thomas W. and Lowry, Glenn D. *Timur and the Princely Vision: Persian Art and Cultur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Los Angeles: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1989.

MacGregor, Neil.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0 objects*. London: Penguin Books, 2010.

Melikian-Chirvani, A. S. "Sa'īdā-ye Gilānī and the Iranian style jades of Hindustan,"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13 (1999): 92.

Melikian-Chirvani, A. S. "Rekab: The Poly-Lobed Wine Boat from Sasanian to Saljug Times," in *Au carrefour des religions*, ed. R. Gyselen, Res Orientales, vol. 7 (Bures-sur-Yvette, 1995): 187-203.

- Melikian-Chirvani, A. S.. "Precious and Semi-Precious Stones in Iranian Culture — Chapter I . Early Iranian Jade,"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New Series/Volume II, (1997): 123-173.
- Nigam, M.L.. "Fresh light on the history of Indian Jade-carving," *Kala, Journal of Indian Art History Congress*, New Delhi, Vol. IX, (2004): 13-18.
- Pinder-Wilson, Ralph and Watson, William, "An Inscribed Jade Cup from Samarkand," *British Museum Quarterly*, vol. 23 (1960-61): 19-22.
- Watt, James C. Y.. *Chinese Jades through Han to Ch'ing*. New York: The Asia Society in association with Weatherhill, Inc., 1980.
-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大英百科全書線上版), <http://www.britannica.com/topic/Qarakhanid-dynasty>, 瀏覽日期：2015年7月10日。

## **A Study of Two Jade Cups of International Contention**

Teng Shu-ping  
Former Chief Curator, Department of Antiquities  
National Palace Museum

### **Abstract**

The eastern area of Central Asia in what is now the Xinjiang region has a mountain range that spans its southern rim known as the Kunlun Mountains. These mountains are a rich source of fine nephrite jade. Throughout history, the area of Hetian in the northern foothills of the Kunlun Mountains (known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before as Yutian) has been an important source of much high-quality jade. As it turns out, there emerged in the area an indigenous art of jade carving probably since the fifth century CE. However, perhaps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tradition of jade carving was local and did not experienc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it instead relied on the needs of neighboring and stronger cultures. As a result, the peoples there produced jades that appealed to and could be sold to them instead. Apparently no records of how these locals in Central Asia viewed their jade products have survived for over a thousand years.

The white jade fluted cup from Hejiacun and the cup with a hornless-dragon handle bearing an inscription indicating its owner as Ulugh Beg are two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jade vessels. Several scholars have already proposed in their studies where these works were made. In 2012, during my trip to Paris and London, I had a chance to personally examine these and other related works. Combined with a study of historical texts and stylistic analysis, my initial conjecture is that the two were probably made in the seventh century and fourteenth to early fifteenth century, respectively, representing fine works of Hetian jade craftsmanship.

**Keywords:** Central Asian jades, Hejiacun, Ulugh Beg

(Translated by Donald E. Bri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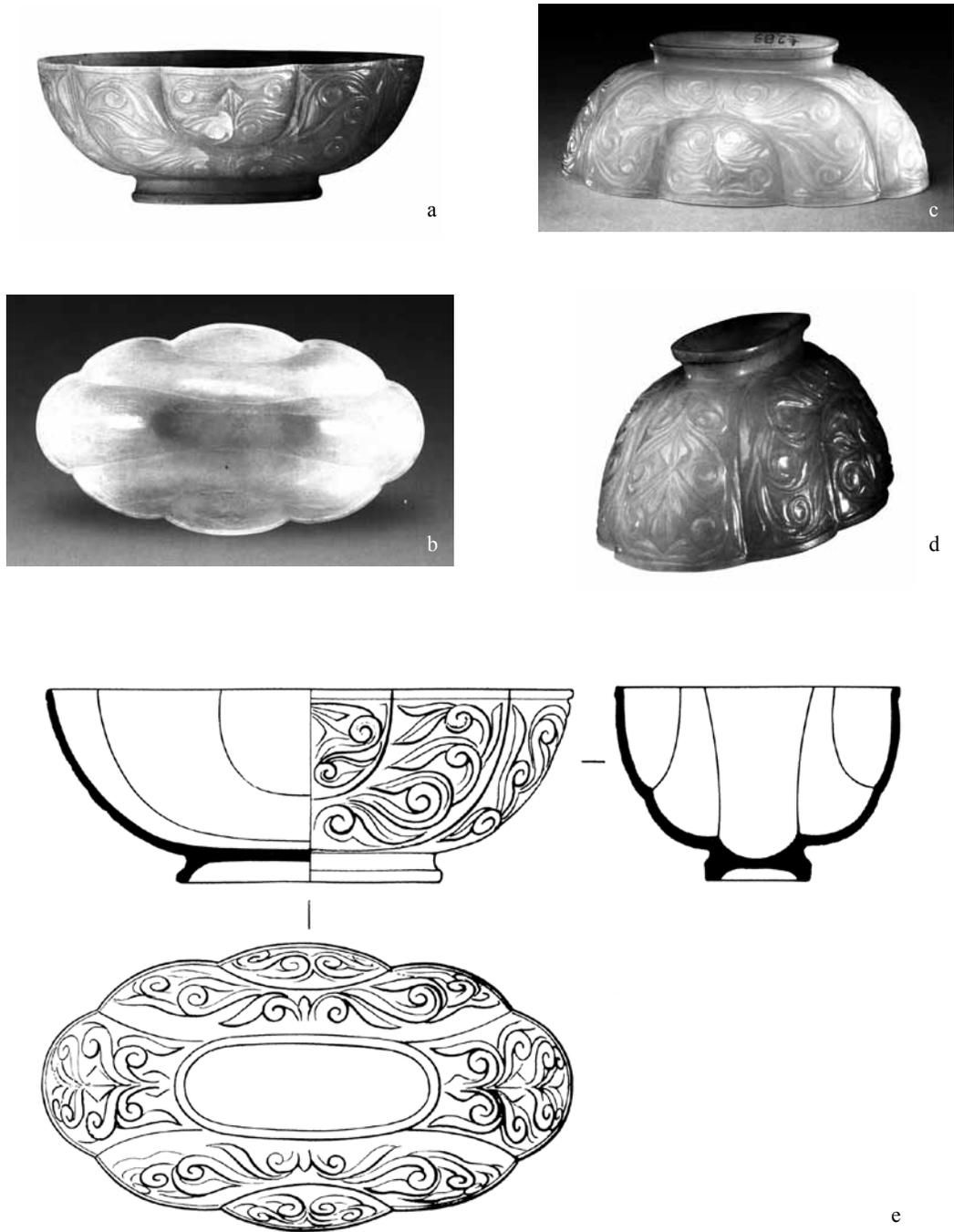


圖1 南北朝晚期至唐初 白玉八曲杯 長10.2 寬5.5 高3.8 壁厚0.15公分 何家村出土  
取自劉雲輝，2000



圖 2 南北朝晚期至唐初 水晶八曲杯 長 9.6 寬 6 高 2.3 公分 何家村出土  
取自劉雲輝，2000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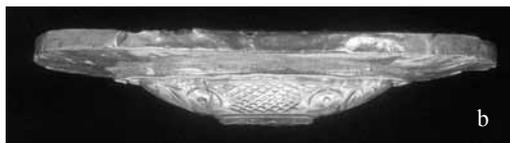


b

圖 3 六至七世紀 薩珊王朝 綠玉石小容器  
長約 5.2 寬約 2.8 高約 1.2 公分 蘇薩  
徵集 羅浮宮博物館藏 (三分之一為補  
修) 取自 Melikian-Chirvani, A. S., 1997



a



b

圖 4 六至七世紀 薩珊王朝 水晶加金框小容  
器 全長 8.9 寬 6.6 高 1.7 公分 蘇薩徵集  
羅浮宮博物館藏 取自 Cernuschi, 2006



圖 5 六至七世紀薩珊王朝 銀碗長 22 寬 11.5  
高 5.4 公分 華盛頓福瑞爾博物館藏  
(Freer gallery 1985.28) 取自 Gunter and  
Jett, 1992



圖 6 六世紀薩珊王朝 多瓣銀碗 長 19.2 寬 12.8 高 4.5 公分 華盛頓薩克勒博物館藏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s1987) 取自 Gunter and Jett, 19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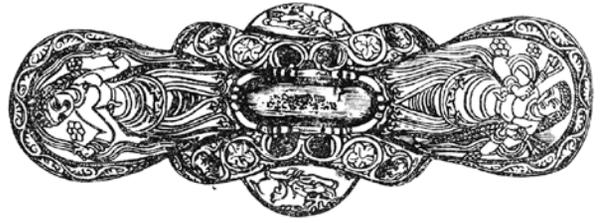


圖 7 薩珊王朝 多瓣銀碗 俄羅斯出土 取自齊東方、張靜, 1998



圖 8 塔吉克片吉肯特壁畫 取自孫機, 1996



圖 9 新疆克孜爾石窟壁畫 取自孫機, 1996



圖 10 懿德太子墓壁畫 取自孫機, 1996



圖 11 圖 3 局部



圖 12 圖 4 局部



圖 13 圖 1 白玉杯一端局部 取自圖 1d、e

三片尖葉成一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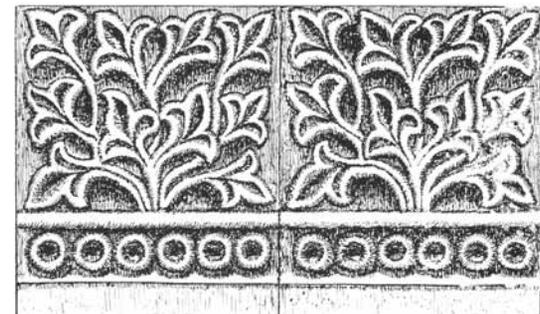


圖 14 薩珊王朝 灰泥牆紋飾 取自 Ferrier, 1989



圖 15 薩珊王朝 灰泥牆紋飾 取自 Ferrier, 19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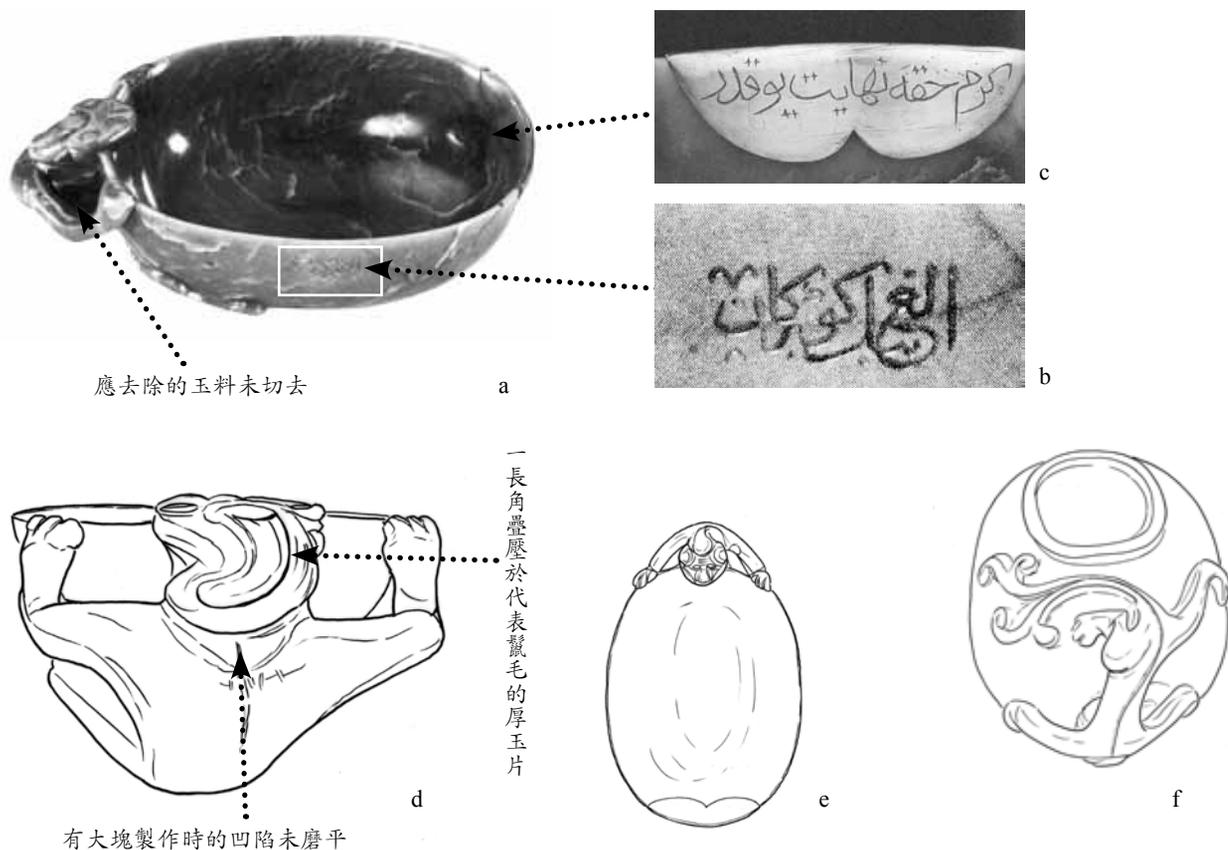


圖 16 十四世紀晚期至十五世紀前半 中亞 玉螭把杯 (兀魯伯款) 長 19.5 寬 12.2 高 7.3 公分 口緣曾修復 大英博物館藏 (BM1959.1120.1) a 取自 Lentz and Lowry, 1989 b 取自 Hansford, 1968 c 取自《看得見的世界史》 d、e、f 係根據筆者所拍攝圖檔請左駿繪製



圖 17 十五世紀前半 中亞 玉龍柄杯 寬 15.9 公分 大英博物館藏 (BM-1961,0213.1) 取自 Lentz and Lowry 1989



圖 18 帖木兒帝國 伊朗或中亞 一四〇〇至一四五〇年 碧玉龍柄圓杯 口徑 8 連柄寬 10.5 足徑 4.4 公分 大英博物館藏 (OA1970.6-4.1) 取自 Brend, 1991



圖 19 元代 金帳汗國 一三〇〇至一三二五年 金龍柄杯 長 13 寬 4.7 公分 聖彼得堡 艾米塔吉博物館藏 取自 Lentz and Lowry, 19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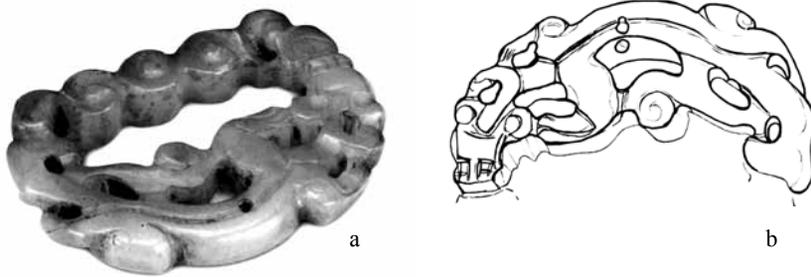


圖 20 北宋晚期至南宋初年（十二世紀前半）螭虎紋玉飾 長3.9寬2.8厚0.5公分 南京秦檜夫人墓（1155）出土 a全器 取自南京市博物館，2011 b螭虎紋局部（左駿據實物圖檔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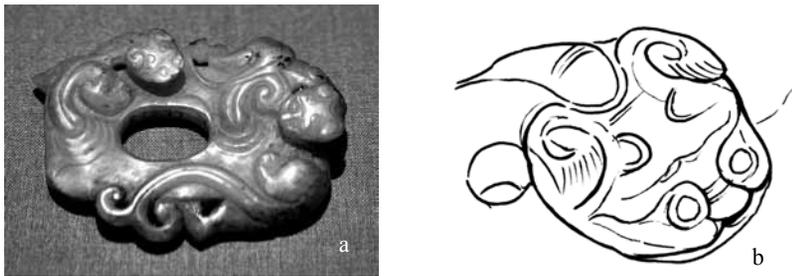


圖 21 北宋晚期至南宋初年（十二世紀前半）螭虎紋鞞形佩 約長5公分 南京秦檜夫人墓（1155）出土 a全器（左駿攝於南京市博物館陳列室） b螭虎頭部線圖 左駿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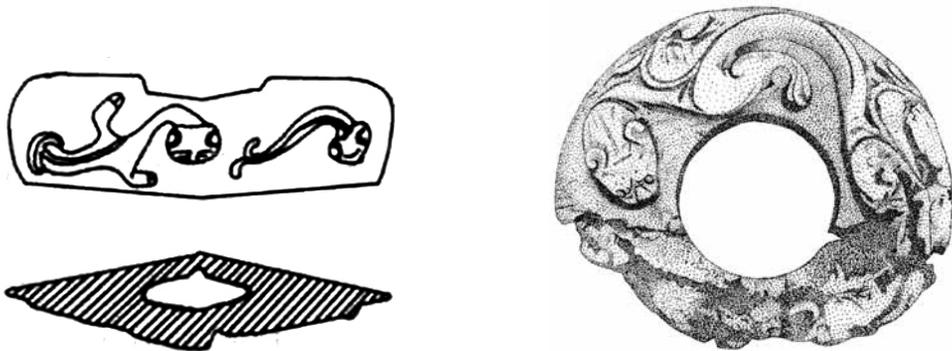


圖 22 北宋晚期至南宋初年（十二世紀前半）螭虎紋劍格 約長3公分南京江寧上坊南宋墓（1165）

圖 23 南宋中期 螭虎紋璧 外徑9.7孔徑3.4厚0.6公分 浙江金華鄭繼道墓（1201）出土 金華市博物館藏 鄭楚玄據趙一新等2008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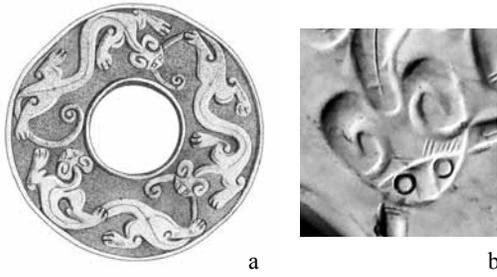


圖 24 南宋中期 螭虎紋璧 外徑 8.1 孔徑 3.1 厚 1 公分 浙江金華鄭繼道墓 (1201) 出土 金華市博物館藏 a 鄭楚玄繪 b 取自蔡玫芬, 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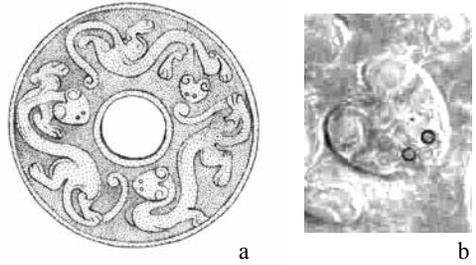


圖 25 南宋 三螭紋玉璧 外徑 10.4 厚 0.7 公分 四川蓬安錦屏鎮西拱橋村南宋墓出土 蓬安縣文管所藏 a 鄭楚玄繪 b 取自張尉, 2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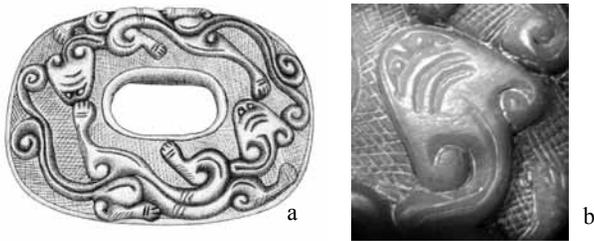


圖 26 南宋末年 螭虎紋方環 長 6.6 孔長 2.3 厚 0.5 公分 浙江南宋墓出土 杭州歷史博物館藏 (8339-899) a 鄭楚玄繪 b 取自蔡玫芬, 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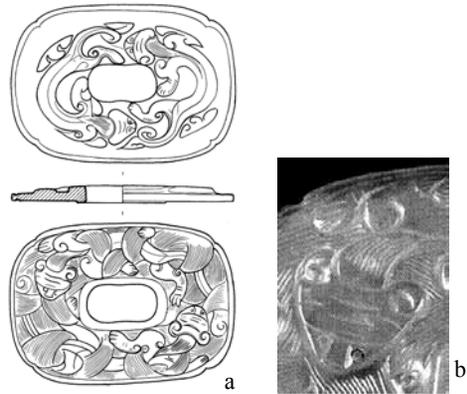


圖 27 南宋末至元初 螭虎紋方環 浙江海寧智標塔地宮出土 取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6



圖 28 南宋中晚期 螭虎紋玉壺蓋 徑 2.76-3.22 厚 3.52 公分 安徽安慶范文虎墓出土 (1301) 取自古方, 2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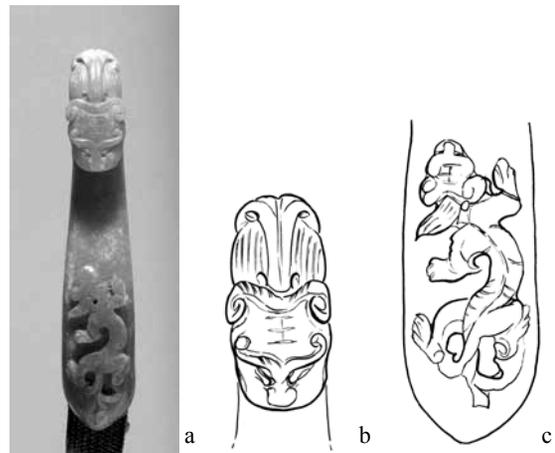


圖 29 元 螭虎紋玉帶鉤 長 12 寬 2.4 公分 甘肅漳縣徐家坪汪氏家族 8 號墓出土 甘肅省博物館藏 a 取自甘肅省博物館, 2006 b、c 左駿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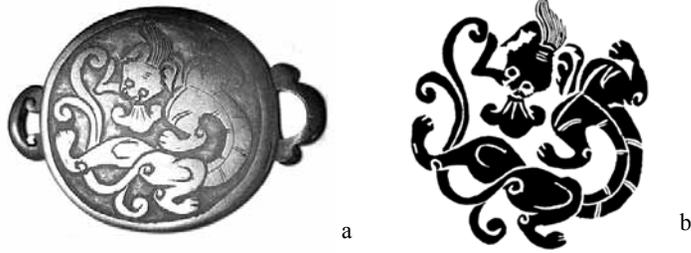


圖 30 元 螭虎紋玉飾 寬3.6厚0.6公分 a彩圖 b拓片 江蘇無錫錢裕墓(1320)出土 無錫博物館藏 a取自馬自樹,1999 b取自徐琳,19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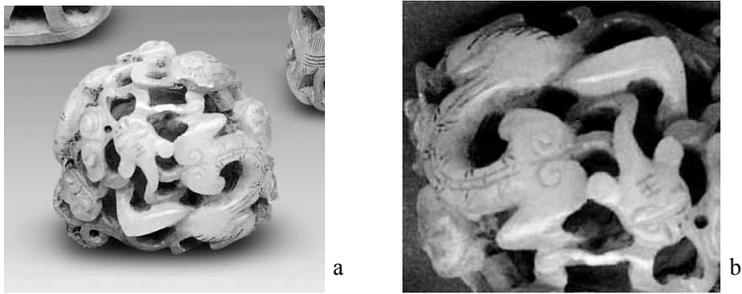


圖 31 元 螭虎紋玉帽頂 甘肅張掖大佛寺金塔殿出土 a全器 b局部 取自甘肅省博物館,19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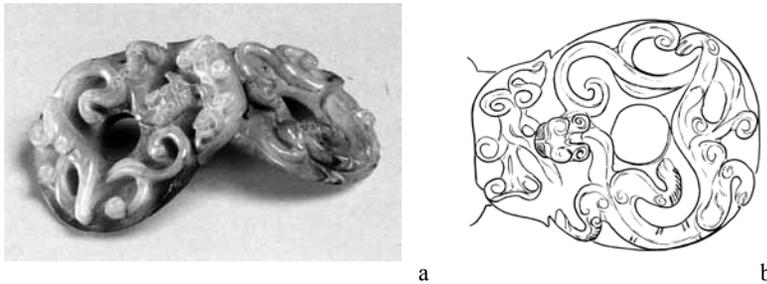


圖 32 元 螭虎紋玉帶飾 長13公分 江蘇溧水縣柳家村墓(1331)出土 南京市博物館藏 a取自Watt,2010 b左駿據實物圖檔繪局部



圖 33 南宋 銀夾層螭虎飾杯高6.9口徑8.6底徑4公分 四川彭州西大街窖藏出土 彭州市博物館藏 取自中國金銀玻璃琺瑯器全集編輯委員會,2002



圖 34 元 玉螭把杯 全高5.6口徑7.5足徑2.9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玉0508) a全器 b螭虎背部刻有一條陰線 c螭虎面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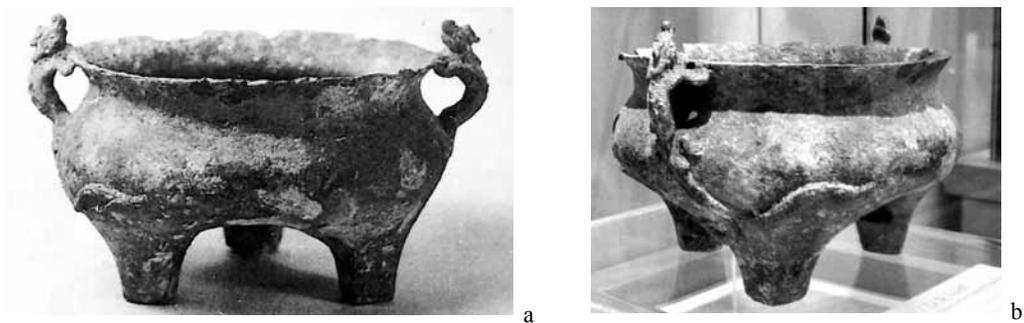


圖 35 南宋咸淳十年（1274）龍柄扁形銅爐 高 12 口徑 15 公分 a 取自衢州市文管會，1983  
b 筆者在衢州博物館展廳拍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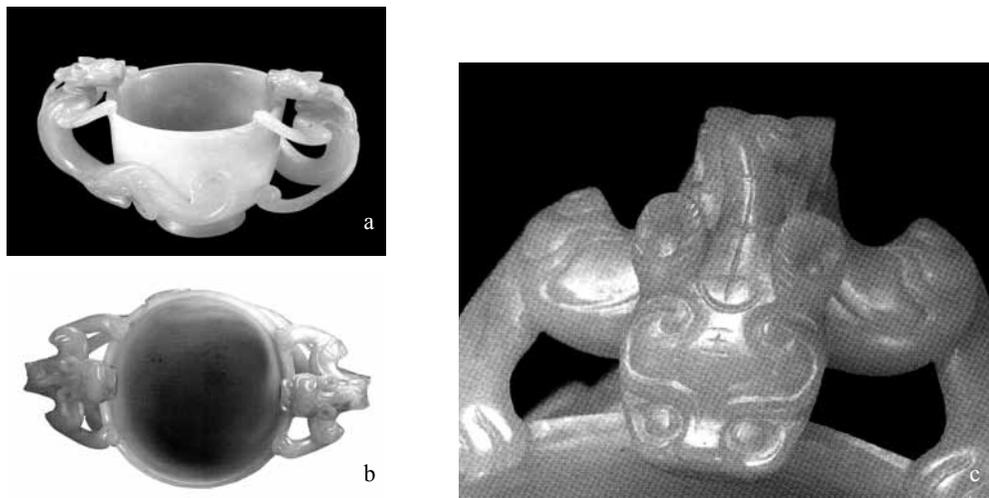


圖 36 明中期 雙螭柄玉水盛 寬 15 全高 7.5 杯口徑 8 高 4.2 公分 北京市南郊萬貴墓（1475）  
出土 首都博物館藏 a、c 取自古方，2005 b 取自張尉，2004



圖 37 明中期 雙螭柄玉水盛 高 5.2 口徑 7.7 底徑 3.2 公分 甘肅蘭州晏家坪明肅藩系延長王墓  
葬出土（約 1588-1593）蘭州博物館藏 取自朱亦梅，2012

